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

张立国 著

台海出版社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

张立国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张立国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5
(台海学术文荟)

ISBN 7-80141-228-1

I. 茅… II. 张… III. 茅盾(1896~1982)-影响-现代文学-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845 号

书 名/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

著 者/ 张立国

责任编辑/ 吕莺

装帧设计/ 张翎

发 行/ 台海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汤北胶印厂印刷

开 本/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228-1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孙中田

能够有机会为远行的故人编选文集，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深度的纪念。是的，一切仿佛都在眼前，情景依稀，故人却悄悄地远去。

想起来那还是80年代的岁月里。东北师大中文系茅盾研究室的牌子虽然挂起来了，但是人手却少得可怜，只有立国、中忱和我在支撑着局面。文章虽然也不时地在发表，却真的感到有些人单力薄。然而那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这中间就有张立国一个。为此，我们曾远寻茅盾的历史踪迹。到茅盾的家乡，得到年轻的桂松的帮助。后来又到湖州去查阅材料。在还没有复印机的日子里，查到的资料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在那些活动里，立国都默默地在用力。回想起来，本书收集的几篇调查报告，便是那时完成的。后来这平实的文字也曾不断地被研究者们引用。

这过程，立国是很用功的。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写出了引人瞩目的研究论文。例如《论〈动摇〉的历史真实》、《关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等，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话语。加上他可人的风度，一时之间，以文会友，颇为一些同行所道及。

在以后的生活中，立国是颇识大体的。他本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上，已经步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又兼而从事双重的职务活动。有时白天坐班尽职，夜里再开车

笔耕，以至生活的秩序常常错位。所以有的朋友说，他后来的病，大体与此有关。然而，他任劳任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一面也不间断地从事着教学工作。他博闻广识，勤于梳理，在细密的文理中，时时闪现出新的见地。现在，收录在文集里的成果，大抵是这样的记录。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茅盾研究的；还有一部分是港台文学研究的成果。论文字量，可能并不显赫，但却从一个方面说明着，一个具有多重负荷的人厚重的一生。

语云，文如其人。在有些人身上，可能不一定是统一的，然而在立国这里，真的是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因此，读其文真的是如见其人。在精细的墨迹中，仿拂斯人尚在，仍然在微笑间，促膝谈心。他会时时把一些新的信息娓娓动听地讲述给你。在问题的讨论中，对有些意见，显然他不一定同意，但是很少有激烈的言辞。和善仿佛是他人生的定格。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他也会宽厚地待人。特别是对待年轻的学生，更是引导有加。自然，有时因为入世比较深一些，也会显得不太直接了当，但是，对于老熟人，这已经是小事一桩了。而今，人已远行。作为他的同事、朋友，在他的文本中我深深地读解到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生命精神。

文集是在桂松、中忱和家属共同努力下编就的，大家嘱我为序，便尽一点职责。

1999年10月10日 长春

目 录



序 孙中田 1

走近茅盾

走近茅盾作品与人物

关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 3

论《动摇》的历史真实 13

杂谈《蚀》的时代描写 26

试论吴荪甫的结局 41

《腐蚀》的时代性与战斗精神 53

异曲同工 各显峥嵘

——《水藻行》和《筏上》文化意蕴比较分析 64

茅盾小说的时事性 78

茅盾的中学时代

——调查报告 97

沈泽民与茅盾的《子夜》 110

沈泽民小传 116

沈泽民生平及著译系年 123

论中国现代文学

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与人物

艾青和他的诗作 150

热讽与冷嘲

——张天翼《华威先生》与沙汀《防空》比较谈 171

在炮火洗礼中的蜕变与新生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 178

承续台湾光复前后诗歌的“桥梁”

——简评诗歌团体“银铃会” 221

中西文化碰撞 传统现代交融

——试论陈若曦《远见》的文化意蕴 228

台湾新诗的发轫与现实主义主流期

——光复前的台湾新诗 238

多元互补 共造中华民族文学的辉煌 301

附录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 易 茗 303

亦师亦友两难忘 逢增玉 310

怀念 朱自强 313

透视文学的历史之真 王 确 317

我的良师 我的益友 康洪伟 321

愧对老师 张皖春 325

走近父亲 张冠夫 328

跋语一 王中忱 331

跋语二 钟桂松 336

走近茅盾

走近茅盾作品与人物

关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

茅盾的处女作小说《幻灭》自问世以来，在评价上历来存在分歧。尽管大多数都认为是一部“瑕瑜互掩”的作品，但在具体估价上有“瑕不掩瑜”和“瑜不掩瑕”两种意见。别林斯基说：“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天才、最正确的是时间。”经过五十多年时代风雨的淘漉，《幻灭》愈加显示出其熠熠的光辉。本文想就涉及《幻灭》评价的几个有关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个时间上的“小”问题

茅盾因其作品长于表现重大的时代、历史画面，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而被誉为“时代的画家”。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幻灭》一发表，就以强烈的“时代性”、“社会性”，引起了读者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幻灭》的时代背景和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问题上，长期以来，忽略了一段比较重要的时间，而这段时间，无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还是在《幻灭》小说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一些评论文章中，一般都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五卅”运动一周年后(1926年)至1927年“‘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家本人有的地方也是这样说的^①)。然而，只要我们细心地研读一下作品，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是一直写到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为止，并且，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细节的描述，直接或间

*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① 茅盾：《写在〈蚀〉的新版后面》，见《茅盾文集》第1卷。

接地暗喻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写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到十月末的上海，当时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白色恐怖时期，茅盾已失去行动自由，本人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之列。当时的客观形势，不便于也不允许直书共产党所发动的南昌起义，所以，只能采取“侧写”等隐蔽的笔法，就是这样，也要担极大的风险；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当这震惊中外的重大革命事件爆发后不到两个月，作家便以惊人的胆略和非凡的远见，通过塑造强连长这个形象，和描写主人公静女士和强猛的爱情纠葛，巧妙地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披露出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这一事件最早的一部作品。

在《幻灭》第十二节中写到，章静在第六伤兵病院结识了在临颖前线负伤的强连长，“一天，这少年讲他受伤的经过”。^①从他的讲述中，知道他所在的部队是七十团。这个细节如果不加注意，会当成无意之笔，以为是作者随意编排的。但是，在这里却蕴寓着作家的一番苦心。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七十团隶属于我们党所掌握的、由叶挺同志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可能，为了强化这一点，在小说中还多次地做了照应的描写。譬如，当强连长神志清醒后，非常关心战事的进展，急着要看报纸；静女士因报上有“鄂西吃紧”的消息，不想让他知道，特意由她有选择地读给他听。强连长何以这样关心鄂西战事，静女士为什么要有所回避，我们据当时的革命史实考察知道，这叶挺所部的七十团，在河南战役之后，奉调参加镇压鄂西夏斗寅部的叛乱。叶挺部在鄂西平叛之后，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武汉汪精卫政府的日趋反动，奉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之命，便开赴九江，稍后又直趋南昌，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作品曲折地再现了这一

^① 《幻灭》，见《茅盾文集》第1卷。以下凡小说中的引文皆出自此版本。

史实，并且在情节的发展中，描绘了当南昌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强连长同营的一个连长，特意上庐山邀他回去参加战斗的情节。

除此以外，从静女士同慧女士谈强连长的家乡住处，和静女士询问强猛同何人打仗这两段对话，也暗示出了南昌起义。十二节静向慧介绍说：“他是广东人。父亲是新加坡的富商。……他的母亲和妹妹另住汕头。”在小说的最后一节，静问强：“究竟是和哪些人打仗？”强回答：“他们要回南去，打我的家乡。”这两处也不是随意写来的。我们把前后连贯起来，便可得知，这正是南昌起义部队的行动路线。由此观之，茅盾在这部作品中，是以寓有意于无形的笔触，迂回隐晦地写出了这一伟大历史的进程。

也许至此作者尤嫌不足吧，在作品的结尾处，通过强连长和王诗陶的嘴，单刀直入地点出了起义的终末。小说最后一节，强连长在静的追问下说出：“日内南昌方面就要有变动。早上来的人找我去打仗。”而到第三天，王诗陶从南昌突然地来到庐山，找到静女士后，用“活泼的声音就讲她最近的事，简单地收束到：‘所以东方明也随军出发了’。”这段似乎不太协调，跳动性很大的文字，隐寓着不便于明言的兴奋的事——就是“八一”起义。“三个人交换了意见之后”，“强仍旧实践他的从军的宿诺”，“因时机迫促”强立刻下山，赶赴南昌追赶部队去了。看到这里再明白不过了，《幻灭》这部小说确是写了南昌起义，而且截止日期当在起义后的第三天左右，这从东方明的随军出发，强连长的迫促下山，足可看出。因为南昌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在八月三日至六日，相继撤离南昌，经瑞金、长汀、会昌向广东潮汕进发。

就茅盾的生活经历来说，《幻灭》所反映的情节，也是有充分根据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公开“分党”后，他接受党的指令，从武汉出发，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到九江后因道路阻隔去不了南昌，才转道牯岭避难，所以，他对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应该知道的。八月末回到上海后，尽管环境险恶，加之

妻子有病，整天守候在侧，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对起义部队的行踪，也是能有所风闻的。同时，作为一个忠实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他能够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变，也是毋庸置疑的。诚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那时的作家对起义的前途和意义理解得非常深刻了，对革命的道路已经了如指掌了。由于作家受世界观和历史的局限，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一时还认识不清，“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①心情是灰暗的。所以，就整篇作品而言，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定的悲观情调。但是，正如茅盾自己所说：“这是幻灭，不是动摇！幻灭以后，也许消极，也许更积极，然而动摇是没有的。”^②《幻灭》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动摇，也没有消极退隐，“从此不管这些事（指革命——引者注）”，而是“另寻了一条路来干”，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的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追求。所以，小说的结尾一扫灰暗的情调，流露出一定的欢快情绪，不但革命者王诗陶的情绪是高昂的，就是多愁善感的小说主人公静女士也是这样。

一个值得重视的革命英雄人物

在《幻灭》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强连长之口，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个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形象。但可能是由于作家没有单独描写，且文字太少而又倏忽即逝之故罢，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在小说的第十二节，当强猛向静女士介绍他在临颍战役负伤经过时，顺使用赞叹的口吻提到了七十团团长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动人情景：这位团长亲临激烈战斗的第一线，负伤后，坚持不下火线，并率领一营人向敌人冲锋，把“进逼的敌人挫退了十多

① ② 《从牯岭到东京》，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里”，最后，胸口又中了敌人的迫击炮弹，英勇地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读过强连长这段口述，在感动之余，不禁油然地会使我们联想到历史上的另一位连长——参加过临颖战役的七十七团七连连长当时所写的《临颖阵亡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战斗进行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团长亲临前沿指挥，“余（七连长——引者）遂将情况报告之。团长安慰余曰：‘……我来了，不要紧。’”遂亲率一、三营战士冲锋。“团长负伤左足。士兵往救护，不许，谓：‘足伤尚能骑马，吾必杀退敌人。’裹创乘马，身先士卒，领导冲锋，士气益壮。团长复受重伤，人马俱仆地，犹大呼冲锋，上前杀去，并谓：‘团长已受伤，你们要死战勿退。’士兵答道：‘团长请放心，我等决不后退；即有一枪一卒，亦与敌拚命。’……”时有六、七个士兵向前救护。团长答曰：‘来两人足矣，余上前杀贼。’”团长又拄着步枪，在两名士兵的护卫下，重新跨上战马，高擎战刀，向前冲去。第三次炮弹炸断了他的皮腰带，穿入胸部，流血不止。牺牲前，仍挺身奋力高呼：冲啊！杀啊！前进！前进！……^①这位团长就是杰出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武昌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8期刊登了《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当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同志在《革命军》副刊第10期上曾专门撰文，称赞蒋先云同志为“超时间性的烈士”。

以上这两段文字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是偶合，何以会在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战斗的情节、牺牲的方式上会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呢？即使在部队的番号上不同，一是七十团，一是七十七团，然而，这两个团实际上都隶属于一个军（十一军），都是临颖战役的参战部队。何况做小说，不是录像，允许在事实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虚构，作家这种七真三假的写

^① 《蒋先云烈士传略》（湖南人民出版社）。

法，实是有意为之，这样虚实并举，比起实写来更略胜一筹。就作家本人而言，当蒋先云烈士英勇牺牲和武昌召开追悼会时，他正在武汉主编党领导下的《民国日报》，所以，对蒋先云以身殉国的英勇事迹，也一定是非常了解的。茅盾在谈到《幻灭》等三篇小说的写作时说：“《幻灭》等三篇小说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①又说：“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②烈士的鲜血未干，尸骨未寒，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又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叛变了革命，攫取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将昔日的战友——共产党人推入血泊之中。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作家的心情是悲愤的，情绪是激越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追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借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哀思，和对背信弃义的阶级敌人的控诉，从而激励人民起来反抗和斗争，实在是合情入理的了。但是，囿于环境的险恶，出版的限制，也只能取“侧写”以至于“曲笔”的表达方式了。

这里，我们所以做一番较长的“考证”，并不是一定想证明小说里面的七十团团长，必是历史上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无疑，但这一情节不仅可以引起我们对生活、艺术之间关系的思考，加深对团长这个艺术形象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幻灭》这部小说思想意义的认识。

一个易被歪曲的人物形象

强连长出现在《幻灭》小说的后半部，这个形象在小说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不但关联着主人公静女士的命运，而且，对于整部小说主题的开掘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直到目前

① ② 《从牯岭到东京》。

为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一些评论文章中，直接分析和评论这个形象的还很少，有的文章在评价静女士时，作为静女士爱情追求上的幻灭和失败的映衬而提到了他；即使这样间接地提到他，也多是歪曲了的，且加了些莫须有的罪名，竟不惜给他加上“新军阀的走卒”，“新式的‘恶魔’”^①等称谓。这不但危及到强连长本人，而且“株连”到静女士，从而也“牵连”到《幻灭》这部小说及其作者。看来强连长真是遭受了莫大的不公之冤！所以，认真而公允地评价强连长，实在是大有必要的。

强连长虽然在小说中出现得较晚，但作家对他从外貌到内心，从出身和家世到思想演进的历程，还是作了精心的刻划。他是一个华侨富商的儿子，但是，家庭生活并不圆满，因为“家里有问题”，所以，母亲和妹妹另住汕头，这使他年轻幼稚的心灵上刻下了一定的创伤。他在学校求学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了社会，参加了革命党，投笔从戎进了革命的军队。但是，指导他这些实际行动的思想武器却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是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是以尼采、柏格森的哲学为根据的，崇拜强力，鼓吹刺激，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这种“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毫无积极意义的，甚或是反动的。但是，我们研究一种主义的历史功过，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接受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来进行全面的考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进行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未来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对于冲破铁桶一样窒闷的封建主义牢笼，唤起民族反帝意识，扫荡一切因袭的旧思想，在客观上还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强连长才接受了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